

#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李根强<sup>1,2</sup>, 谭银清<sup>3</sup>, 陈益芳<sup>3</sup>

- (1.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2. 新乡医学院 心理学系, 河南 新乡 453003;  
3. 重庆邮电大学 移通学院, 重庆 合川 401520)



**摘要** 本文通过 OLS 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结果表明: 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 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 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 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 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 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 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关键词** 农民工;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收入差异; 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F 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6)02-0090-06

**DOI 编码:** 10.13300/j.cnki.hnwkxb.2016.02.013

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促进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但是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 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的束缚下却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愈发凸显。1982 年, 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 户籍制度开始松动, 一些头脑比较灵活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30 多年来, 数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镇, 从“盲流”到“农民工”,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 2.74 亿, 比 2013 年增加了 501 万人, 增幅为 1.9%,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 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也不断增加, 2014 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 489 元, 比上年实际增长 9.2%, 增幅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sup>[1]</sup>。

然而, 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能否持续增长? 靠什么来支撑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 学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研究, 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的好坏, 是影响农民工能否就业并持续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的根源所在, 也是农民工能否支付城市生活的成本以立足城市的关键所在, 而这两项却正是我国进城务工农民的弱项<sup>[2]</sup>。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 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sup>[3]</sup>, 人力资本对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能力具有重要影响<sup>[4]</sup>。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要素, 是导致劳动者收入差别的关键因素<sup>[5-7]</sup>;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大学教育对工资的回报率最高, 高中次之, 中小学最低<sup>[8]</sup>; 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教育对农民工的工资回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sup>[9-10]</sup>。相比之下, 培训作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有效手段, 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 职前培训和在职培训皆能有效促进农民工收入的增加, 且前者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sup>[11]</sup>。在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中, 健康体现了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是其他构成要素的重要载体。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之间存在着循环作用机制, 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提高农民工的单位时间收益, 但是农民工个人收入的获得同时又是对健康的损耗, 而健康状况的恶化反过来会导致

收稿日期: 2015-09-02

基金项目: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重庆农业现代化的模式与路径研究”(15SKG232);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团队内非伦理行为互动机制研究”(2014-gh-650, 2015-zd-158)。

作者简介: 李根强(1977-), 讲师,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组织行为学。

农民工单位收益率的下降<sup>[12]</sup>。

社会资本指可供个体或集体获取资源的社会网络<sup>[13]</sup>。在劳动力的流动过程中,社会资本体现为移民个人在社会网络及其社会结构中获得的成员身份,移民通过这一身份可以获得工作机会、低息贷款等稀缺资源<sup>[14]</sup>。我国是一个具有明显“差序格局”状态的人情社会<sup>[15]</sup>,社会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获取社会资源的捷径<sup>[16]</sup>,对个人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sup>[17]</sup>。现阶段我国流动农民工主要是通过亲属、朋友介绍和引荐来获取城镇就业机会,这一非正式途径对流动农民工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和生存机会具有重大作用<sup>[18]</sup>,因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民工寻找到更加合意的工作,对他们自身的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sup>[19]</sup>。当前我国社会网络的生态由传统的“整合型”社会和现代的“跨越型”社会共同支撑,两种社会形态所对应的“跨越型”和“整合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提升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具有互补性<sup>[20]</sup>。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存量大小不仅关系到自身收入提高和福利增加,而且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sup>[21]</sup>。

已有文献虽然就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做了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虽然单独探讨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文献较多,但就二者进行综合考察并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的是传统的均值回归模型,而均值回归实际上是以因变量(农民工收入)的条件分布是对称分布为前提,若违反这一前提,因变量的条件期望则很难反映整个条件期望的全貌;同时传统OLS均值回归以最小化的残差平方和为目标函数,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新近研究发现由于工具性社会资本的分布不均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区域差异<sup>[22]</sup>,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别<sup>[23-24]</sup>,因此传统的均值回归方法很难准确刻画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而分位数回归则能很好地克服这一方法的不足。该方法通过对因变量的若干条件分位数进行估计,可以全面地反映出因变量的条件分布信息,同时该方法以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能较好地排除极端值的影响。为此,本文拟采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抽样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揭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机理。

## 一、变量设置、数据来源及描述

### 1. 变量设置

本文变量由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三部分构成。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民工收入,解释变量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的测量通常采用文化程度、培训、健康等3个指标作为核心变量;社会资本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其测量则相对困难,通常的做法是以社会网络的宽度和深度作为替代指标,本文采用“能够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熟人和亲戚的数量”这一问项对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该问题既能反映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宽度,又能体现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深度,因此可以较好地反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

除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两个主要变量外,农民工收入还可能会受到年龄、性别以及工作本身复杂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引入这些变量作为影响农民工收入的控制变量。变量具体设置如表1所示。

### 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CLDS)是985三期“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特色数据库建设”专项内容,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建立劳动力、家庭和社区3个层次的追踪数据库,从而为实证研究提供基础数据。该调查聚焦于中国劳动力的现状与变迁,内容涵盖教育、工作、迁移、健康、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众多研究议题,是一项跨学科的大型追踪调查。2012年7月至8月间,该中心在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成功完成村居问卷303份,家庭问卷10612份和劳动力个体问卷16253份。本文从劳动力个体问卷中按照“具有农村户籍,从事非农产业”这一标准筛

表 1 变量释义及样本描述

变量类别	变量定义与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b>因变量</b>					
农民工年收入/万元	被访农民工 2011 年工资收入	20.00	0.05	2.38	1.72
<b>自变量</b>					
文化程度	未受过正式教育=1;小学=2;初中=3;高中、职高、中专、技校=4;大专=5;本科=6;硕士及以上学历=7	7	1	2.87	1.22
培训	有专业技术培训经历=1;没有专业技术培训经历=0	1	0	0.22	0.41
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1;不大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5	1	3.91	0.83
社会资本	一个也没有=1;1~5 个=2;6~10 个=3;11~15 个=4;16 个及以上=5	5	1	2.83	1.30
<b>控制变量</b>					
年龄	被访者填报的实际年龄	66	16	36.51	11.15
性别	男=1;女=0	1	0	0.60	0.49
工作难度 (掌握目前工作所需要的时间)	一天=1;几天=2;大约一周=3;不到一个月=4;一个月到三个月=5;超过三个月,不到一年=6;一至三年=7;三年以上=8	8	1	4.07	2.22

选出农民工样本 1 700 个。

### 3. 数据描述

样本中男性农民工 1 021 人,占总体的 60.1%;女性农民工 679 人,占总体的 39.9%;其中年龄最小为 16 岁,最大为 66 岁,平均年龄 36.51 岁,标准差为 11.15 岁,因此在年龄结构上老一代中青年农民工依然是农民工的主体;文化层次上,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 2.87,也就是说农民工文化程度总体上处于初中及其以下水平,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

从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和收入来看,农民工“工作难度”的均值为 4.07,亦即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可掌握,表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总体上以简单劳动为主;农民工收入最小值为年收入 0.05 万元,最大值为年收入 20 万元,均值为 2.38 万元,标准差为 1.72 万元,另 JB 检验显示(见图 1)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拒绝对称分布假设,呈明显的偏态分布,由此表明农民工在收入上出现了明显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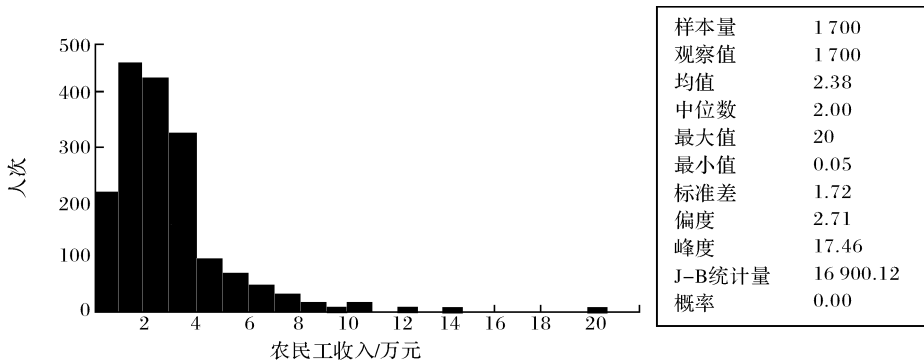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工工资收入的 JB 检验

## 二、实证检验

### 1. 模型构建

传统线性回归首先假定因变量的条件分布呈对称分布,数据分布符合随机性、独立性、正态性及常数方差等特征,以此假定为基础再采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其实质是假设不同分布点上解释变量的效果没有差异,而实践中由于调研数据很难达到传统线性回归的数据要求,以至于模型解释力大大降低。Koenker 和 Bassett 提出的分位数回归估计方法放宽了对数据分布的条件要求,从而大大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相比于传统的线性回归,分位数回归可以帮助研究者观察到分布中不同分位点上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不同边际效应,其基本模型为:

$$y_i = x_i' \beta_\tau + u_{i\tau} \tag{1}$$

式(1)中,  $y_i$  为农民工个体  $i$  的年工资收入观测值,  $x_i'$  为解释变量向量,  $\tau$  表示需估计的分位数值, 根据式(1)进一步可推出:

$$Q \text{uant}_\tau(y_i | x_i) = x_i' \beta_{i\tau} \tag{2}$$

式(2)中,  $\beta_\tau$  为  $\tau$  条件分位数函数的待估参数且随  $\tau$  的变化而变化,  $Q \text{uant}_\tau(y_i | x_i)$  表示在给定  $x_i$  的条件下  $y_i$  的  $\tau$  条件分位数。  $\tau$  的取值范围为  $[0, 1]$ , 由此我们可以获取在给定  $x$  条件下  $y$  的整个分布。而分位数回归的系数估计则可通过以下线性规划方法求出。

$$\min_{\beta} \sum_{i: y_i \geq x_i' \beta} \rho_\tau |y_i - x_i' \beta| + \sum_{i: y_i < x_i' \beta} (1 - \rho_\tau) |y_i - x_i' \beta| \tag{3}$$

式(3)中,  $\rho_\tau$  的函数形式如下:

$$\rho_\tau(\epsilon) = \begin{cases} \tau, \epsilon \geq 0 \\ (\tau - 1)\epsilon, \epsilon < 0 \end{cases} \tag{4}$$

通过对上述最小化目标函数的求解, 可以估计出不同分位数下的系数估计值  $\beta_\tau$ 。本文中, 因变量  $y_i$  表示样本中农民工 2011 年的工资收入; 自变量向量  $x_i'$  包含农民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各控制变量; 分位点  $\tau$  取下四分位数 0.25, 中位数 0.50, 以及上四分位数 0.75。

### 2. 计量结果与分析

表 2 汇报了各变量对农民工收入的回归结果, 为了更详细地揭示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其差异, 本文将采用传统的 OLS 回归和分位数回归两种计量方法。

(1)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差异。 OLS 回归结果表明, 人力资本变量中的文化程度、培训、健康这 3 个变量对农民工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97、0.428、0.086, 但社会资本变量的回归系数仅为 0.060, 小于人力资本各变量的回归系数, 而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对低分位点(0.25)和中分位点(0.50)的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农民工工资收入的高分位点(0.75), 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0.067, 依然低于同分位点人力资本各变量的影响效应。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差序格局社会, 人情和关系作为社会交往的粘合剂、润滑剂和催化剂理应是影响个体经济收入的重要变量, 那么是什么原因削弱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劳动力市场信息由国家把控, 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同样由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配置,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人情关系强, 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大; 人情关系弱, 得到照顾的可能性就小; 没有人情关系, 除偶然的例外, 就不会得到照顾。信息和职业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sup>[17]</sup>。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开始自由流动, 劳动力市场信息也变得越发透明, 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开始越来越看重求职者的人力资本, 因此人力资本取代社会资本成为影响劳动者收入的主要变量。

表 2 各变量对农民工收入的回归结果

变量	OLS	分位数			
		0.25	0.50	0.75	
人力资本	文化程度	0.197*** (0.037)	0.158*** (0.024)	0.126*** (0.031)	0.216*** (0.044)
	培训	0.428*** (0.103)	0.128* (0.068)	0.459*** (0.087)	0.458*** (0.114)
	健康状况	0.086* (0.048)	0.103*** (0.032)	0.106*** (0.040)	0.119** (0.054)
社会资本	0.060** (0.030)	-0.007(0.020)	0.032(0.025)	0.067** (0.033)	
年龄	-0.011*** (0.004)	-0.006** (0.003)	-0.010*** (0.003)	-0.010** (0.004)	
性别	0.707*** (0.083)	0.462*** (0.056)	0.562*** (0.070)	0.786*** (0.091)	
工作难度	0.093*** (0.019)	0.048*** (0.013)	0.071*** (0.016)	0.108*** (0.021)	
常数项	0.802*** (0.290)	0.305(0.203)	0.909*** (0.244)	1.029*** (0.309)	
观测值	1 700	1 700	1 700	1 700	

注: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二是现代性对农民原始社会资本的冲击。村庄是农民生活的重要场域,是农民守望互助,在情感和经济上相互支撑的重要场所。村民之间相互介绍职业信息,引荐求职渠道,外出务工的老乡之间互相帮助,原始社会资本可以说是农民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初始资本。但是随着现代性对村庄的渗入,村民的人情交往开始精于算计,村庄的人情开始出现异化,人情异化表面上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甚至会因此解体<sup>[25]</sup>,农民的原始社会资本遭到严重侵蚀。

三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属性特征阻碍了农民工向上流动。长期来看农民工只有通过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才能实现其经济收入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更依赖于异质性的新型社会资本。但农民工的交往圈子多限于老乡或工友之间,社会资本的同质性较强,这一同质性不但会阻碍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也导致其质量难以提高。再加之长期以来城市对农具有“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强烈倾向,农民工事实上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的尴尬境地,农民工的这一处境反过来会更加强化其社会资本的同质性,进而进一步阻碍农民工的阶层流动。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中等及其以下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2)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无论是 OLS 回归还是分位数回归都表明文化程度、培训和健康皆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不过总起来看,培训比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更大,而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显示出在中、高分位点处,培训的影响效应要显著高于受教育程度,这一结果与农民工的从业结构具有很大关系。我国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此类行业对从业者的文化程度要求较低,但对劳动者的工作熟练程度却有较高要求,而培训能增强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提升农民工的劳动熟练程度,对提高农民工收入,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具有重要作用。

### 三、政策建议

#### 1. 努力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分位数回归则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因此,努力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对改善农民工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一是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增强农村师资力量,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同时要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从源头上提高农民工素质;二是要构建起由政府牵头,企业“搭台”,社会参与的农民工培训机制,实现农民工职业培训常态化和制度化;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让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在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

#### 2. 设法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

在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也要设法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改善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状况,则需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三方力量,构建起农民工社会资本培育机制。一是政府要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加强制度供给。政府应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突破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二是企业要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组织保障。企业应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让工会不但成为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组织,而且成为农民工构建社会网络的重要平台。三是社会要为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培育发挥支持作用。一方面社会非政府组织可以帮助和支持农民工建立自己的协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社会媒体应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消除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隔阂,帮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 参 考 文 献

[1] 国家统计局. 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15-04-29)[2015-06-15].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

201504/t20150429\_797821.html.

- [2] 黄晶. 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城市化发展[J]. 经济问题探索, 2004(6): 43-46.
- [3]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51(3): 1-17.
- [4]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 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J]. 经济研究, 1999(6): 71-80.
- [5] MINCER J.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M].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74.
- [6] DEWING R, YAMAUCHI F. Human capital, mobility, and income dynamic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J].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Research Institute, 2010(3): 11-34.
- [7] MESSINIS G, CHENG E. Earning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China: the migrant worker experience[J]. Computer Science and Education Science, 2009(10): 42-56.
- [8] 陈晓宇, 闵锐方. 论中国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与劳动力市场化[J]. 教育研究, 1999(1): 34-40.
- [9] 罗锋, 黄丽.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非农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1): 10-18.
- [10] 赵海. 教育和培训哪个更重要——对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1): 40-45.
- [11] 张世伟, 王广慧. 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0(1): 34-38.
- [12] 苑会娜. 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与收入——来自北京市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09(5): 56-66.
- [13] PUTNAM 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 [14]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the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0, 1( 24 ): 193-211.
- [1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36.
- [16] 张海东, 杨隽. 转型期的社会关系资本化倾向[J]. 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 53-58.
- [17] 边燕杰, 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2): 77-91.
- [18] 孙立平. 断裂[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07.
- [19] 唐灿, 冯小双. “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00(4): 72-86.
- [20] 王春超, 周先波. 社会资本能影响农民工收入吗? ——基于有序响应收入模型的估计和检验[J]. 管理世界, 2013(9): 56-68.
- [21] 叶静怡, 周晔馨. 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民工收入——来自北京农民工调查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0(10): 34-46.
- [22] 武岩, 胡必亮.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民工收入差距[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6): 50-61.
- [23] 王春超, 何意鑫.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化[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4(4): 26-44.
- [24] 纪韶, 朱志胜. 外出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与向上发展促进机制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研数据[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1): 4-11.
- [25] 贺雪峰. 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20-27.

(责任编辑: 刘少雷)